

围观王石 不如思考婚姻是什么

谨防“幸福指数”异化为新政绩工程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至少18个省(市、区)明确提出了“幸福”的概念。去年的数据则显示,已有100多个城市提出建设“幸福城市”。研究者认为,随着经济发展,人的主观感受更加被重视是必然趋势,不过追求“幸福”应注重实质内容,避免陷入空谈。(10月30日《新京报》)

从追求GDP到追求民众幸福,这是政府施政理念的一大进步。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是促进人的发展,让民众生活更幸福既是政府施政的内在要求,也是改革开放的目标所指。按理说,追求GDP增长就是为了造福于民,两者相互统一而非彼此矛盾,然而片面的GDP考核让这些地方政府只重视GDP而忽视民众幸福,并由此衍生出“黑色的GDP”、“带血的GDP”、“有毒的GDP”。正如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所言,目前我们不能抛弃GDP,但是需要超越GDP。所谓“超越GDP”,就是将增加GDP作为造福于民的手段,而不是将其作为目的。在某种意义上,“幸福”成为诸多地方政府的施政目标,是淡化GDP考核的必然结果,也是践行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

同时也应该看到,幸福是一种主观感受而非客观数字,每个人对幸福的理解不同,都有自己所感知的幸福和不幸,鞋子合不合适只有脚知道。这就难免带来一个问题:地方政府认为辖区内的居民很幸福,但是很多居民并不这样认为,而是认为自己“被幸福”。幸福不幸福由谁说了算、用哪些指标来衡量,这是“幸福”作为政府施政目标所面临的重大难题。

河南省平顶山市几年前就在建设“幸福城市”,每年发布“幸福指数”,对辖区各县(市)区“幸福指数”进行排序,并作为考核官员的内容之一。但是官方发布的“幸福指数”遭到民间的强烈质疑。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幸福指数”是当地政府关门来单方面运作的,群众没有发言权、监督权,甚至对“幸福指数”的构成不知情。民众幸福不幸福几乎完全由官方说了算,显然是非常可笑的。这说明作为政府施政目标的“幸福”很容易沦为个别官方自娱自乐的游戏。GDP是一种硬指标、客观数字,尚且有地方政府及官员弄虚作假,往GDP数字里“注水”,“幸福”作为一种难以量化、弹性很大乃至见仁见智的软指标,其弹性操作空间更大,弄虚作假更容易,而且很难证实或证伪。防止“幸福注水”、避免民众“被幸福”,这是建设“幸福××”的关键,也是其难点所在。

托尔斯泰说得对:“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民众的不幸福虽然多种多样,但是民众的幸福需要诸多共同条件的支撑,比如收入不断增长、物价相对便宜、社会福利增加、贫富差距缩小、社会公平正义、人人机会均等、民主法治成为人们的共同信仰……如果政府致力于这些幸福条件的创造和维护,则民众的幸福感自然会如期而至。切莫只盯着“幸福指数”而夸夸其谈,切莫让“幸福指数”异化为新的政绩工程。

10月30日,在网友“激将”下,湖南汉寿县政法委书记张天成在微博上将自己和家人的财产一一公示,没有存款,欠债4万。张天成强调,他并不想引起轰动效应,不想出名,也不想被打扰。公布财产,不代表组织,也不代表领导,只代表他自己。今后他还会持续更新财产状况,也将继续选择在微博上公布。

期待“自曝家产”有“蝴蝶效应”

不想追求轰动效应,但仍然引发了舆论场的普遍关注,这并不令人奇怪。官员财产公开,社会共识早已达成,在制度设计层面也不是新鲜话题,却一直进展缓慢。公众的翘首以待,让官员财产公开成了常谈常新的话题。

张天成网上公开家庭财产,不仅以个体化方式刷新了这一话题,而且无形中显示出,在实施财产公开最可能的阻力方,并非不存在继续推进的基础。实际上,中国社科院2011年发布的《法治蓝皮书》就曾透露,70%的被调查公职人员认为应当公开其财产状况。张天成公布家庭财产之举表明,这种认知并非完全是虚言之辞。只要建立起恰当的外部压力机制,公布财产就是可行的。

只要收入合法,官员何惧财产公开。但也要看到,尽管在公众和官员两个层面,官员财产公开已是共识,也有张天成这样的官员敢于主动公开财产,这种情况毕竟寥寥。实际情况是,目前对于官员财产公开,存在应然和实然的巨大差异。人人皆知应该推进,制度设计层面也有相关准备,却难以推进。官员财产情况,仍限于内部申报的“室内阳光”中,而无法袒露于公共视线。许多时候,“表哥”、“房叔”式财产的公开,是通过网上发掘这样的非正式途径实现的,这并非官员财产监督的运行机制。

官员财产公开的共识何以没有转化成机制生长的动力?需要找到内在原因。比如,有没有做好官员财产公开应有的动员。这种动员既包括此前新疆阿勒泰、浙江慈溪等地先行试验的总结,也包括组织体系的准备。张天成网上公布家庭财产的同时强调,公开家庭财产是个人行为,而非组织行为。相信他剥离财产公开的公共性背景,是出自对实际情况的深刻认知。比如,官员财产公开的定义是否能早日明晰。围绕官员财产公开范围界定到哪一步,什么性质的财产需要公开,一直充满争议,并成为官员财产公开的技术障碍。又如,对于官员财产的外部监督应该如何授权?

即使现阶段官员财产公开无法一步到位,推进过程中缺失的环节也须尽早到位。这既需要张天成网上自曝家产所展现的官员自律,更需要严密制度搭建的制度他律。公众的良久期待,需要尽早化为行动。

王石婚变的事沸沸扬扬地闹了好几天,另一位地产大亨潘石屹起初还在微博上出言调侃,日前却被网曝私生活已经7岁了,后虽有任志强出面辟谣,不过事件本身倒又一次印证了“热闹看多了终成杯具”那句话。

从小明星到大地产商,从王石到潘石屹,王石这场婚变,俨然有发展成一场全民狂欢的趋势。“不相信爱情了”又一次成为人们的口头禅。其实王石是地产商,不是传教士。他离个婚触动不了多少人的爱情观。使人们真正产生焦虑的,是这个事件令人联想到的中国婚恋结构的解体。婚姻还要不要以爱情为前提?还要不要以从而为追求的目标?抛开这个事件本身的花边与八卦,这才是我们真正应该审慎思考的问题。

曾几何时,信奉家和万事兴的中国式婚姻是举世公认的超稳定结构,然而,据民政部2011年公布的数据显示,仅当年一季度就有46.5万对夫妻

办理了离婚手续,平均每天解体家庭5000对。截止到2011年,中国离婚率已连续递增7年,“中国式离婚”已经成为一个举世瞩目的现象。在这样一个前提下,“爱情”还值不值得相信,并成为越来越多人心里发毛的问题。

中国人所以对婚姻和爱情丧失信心,和中国近些年来来的社会环境脱不开关系。一方面,这些年来的社会变化算得上是沧海桑田,不少人在这种变化中别谈爱情,连自我的定位都迷失了。另一方面,社会各阶层差距的加大,也让不少人觉得,与其靠自己努力,不如直接与财富和权力联手来得更简便些,这就是“嫁得好,少奋斗十年”这一口号的内在逻辑。有卖自然有买,广州近日爆出“亿万富豪十城相偶秀”,在富商们开列的条件中,从相貌、学历到“女性的纯洁之身”一应俱全,唯独没有感情在场。婚姻到了这个份儿上,已经不是有没有爱情的问题了,而是有没有廉耻可言的问题。

婚姻是什么,无非是感情、忠诚和责任。当你把这些东西一一细化的时候,你发现它们其实都是爱情的衍生品。恩格斯说:“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其实,没有爱情的婚姻也注定不会幸福,基于感情的婚姻自由是我们社会应当守护的底线。对于那些选择“娶了权力”、“嫁给金钱”的人来说,“宁愿坐在宝马车里哭,也不愿坐在自行车上笑”的确是他们的选择,但要搞清楚,哭毕竟是哭,笑毕竟是笑。

王石婚变,原因究竟如何,是当事人的隐私,与公众无关,作出什么决定,是当事人的权利,我们更应充分尊重。公众在这场地产大亨的“家务事”中终究只不过是围观者而已。但当这场事件逐渐退场时,给公众留下的,绝不应该仅限于“不相信爱情”那么简单。到底是什么让我们不再相信爱情?什么是婚姻中亘古不变的东西?这才是我们真正应该问的。

王昱



喝酒误事,若对酒兴正浓的人说这样的话,会被他轻蔑地反击说:俗!是啊,想想古人饮酒的种种风采吧!刘伶在屋里喝酒喝到全身赤裸,说:如果我醉死了,就地把我埋了……喝酒把命喝丢了的都有,误点事算什么?但一般的人,别说喝丢了性命,喝丢了一辆电动车

都会被重新打回俗人的原型,何况现在在喝丢的是一辆奔驰车。幸运的是,车后来找到了,更幸运的是,喝成这样酒后驾车,居然没弄出车祸。除非真有传说中刘伶般的洒脱,否则,喝酒还是要考虑后果,别太过。文/小强 图/春鸣

海监队“零报考”无关“爱国”

2013年国家公务员考试的报名阶段已落下帷幕,据国家公务员局10月24日公布的数据可以看到,今年共有132个职位无人报考,而在这里面有5个来自国家海洋局东海分局的海监执法船舶船员职位引起了大家的关注,网友纷纷猜测无人报考是受到钓鱼岛局势的影响。

日本媒体也关注到了此事,《日本经济新闻》将此事与“日本人踊跃报名海上保安厅队员”进行了比较。今年秋季进行的日本海上保安学校入学考试申请人数为去年的2.5倍,达到了7708人。难道真如某些媒体所说,中国年轻人空谈爱国,不敢上前线?

这当然是一种误读。今年国考报名结束后,共计有132个职位无人报考

或无人通过资格审查,国家海洋局东海分局的5个“零报考”职位,便位列其中。有趣的是,截至10月24日18时,在这些“零报考”职位中,却有将近一半的职位来自国税系统,比如贵州省国家税务局、吉林省国家税务局、海南省国家税务局等。按照上面说的那些人的逻辑,难不成,中国年轻人空谈爱国,机会来了却沽名钓誉?

更关键的是,国家海洋局东海分局本次共公开招聘30个职位,其中不乏需要“上前线”的工作,比如“执法队员”,就需要“不晕船、长期从事海上执法工作、日语二级”。这个只招1人的职位,就引来了377人报考。而海监4支队的“执法船舶船员”职位,只招3人,也引来了41名合格报考者。可见,实情是30个职位中只有5个是“零报考”,绝不是所谓的“无人报考海监队”。

那5个职位为何会“零报考”呢?首先,报名系统有审核流程,不通过资格审核的报名者,是无法被最终列为合格报考者的,该职位最终对外显示“0人报考”,不代表真的就无人报名。其次,虽然同为“执法船舶船员”,但这5个职位明显比其他同类职位的要求高出一截,比如要求报考者“持甲类船舶船长任职证书”或“持甲类船舶大副任职证书”等,这几乎是一般应届毕业生所无法具备的条件。此外,能够具备此资质者大多已经触及国考“35岁”上限,或者已经拥有了比较丰厚的薪酬,海监职位难以对其产生吸引力。

总之,海监职位“零报考”根本无关爱国,只是双向选择机制下的一种正常现象。国考虽是独木桥,但年年都会有不少职位“零报考”,没必要对此过度解读。

伯通

“霸王讨债”,银行为何如此霸道

这样的事情,不仅匪夷所思,而且令人恐惧。试想匪夷所思,是因为人们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冠冕堂皇的银行竟会做出这种不仅违法而且下流的手段;说莫名恐惧,是因为人们担心,与“法官银行”打交道,自己的隐私乃至人身安全如何保障?讨债公司都是非法机构,这个事实尽人皆知。他们雇请社会闲散人员甚至有黑社会背景的人员,承揽讨债追讨业务,采取威胁、跟踪或损坏债务人名誉等手段讨债,对债务人及其家人造成骚扰甚至威胁人身安全,不仅侵犯了公民的权利,更破坏了正常的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然而就是这样的非法机构,竟会银行用作自己的商业伙伴。

客户因信用卡透支等原因欠钱,却又赖债不还,银行作为债权人当然应该追讨。但讨债也要依法行事,诉诸法律,法庭自会秉公裁决,保护债权人的权益。现在南京这些银行不进“法门”进歪门,不找法院找讨债公司,肆意妄为,不但把客户资料泄露给讨

债公司,对客户造成各种安全隐患,而且是在践踏法律。这些年,银行一直在说与“国际惯例”接轨,其实却是有利可图的“惯例”就迫不及待拿来,甚至还要搞“伪惯例”来蒙人,而改善服务之类需要增加成本的“惯例”则在因为又曝出雇讨债公司追债的内幕,人们不能不问:这难道也是“国际惯例”?

不能不说的是,信用卡透支赖债问题,其实银行也难辞其咎。信用卡对银行而言是块肥肉,众多银行以跑马圈地的思维行事,不顾客户质量滥发信用卡——卖场门口用礼品招徕市民办卡,到大学里给学生“送卡”,到企事业单位“派卡”……不到10年,信用卡发行量增加近90倍达2.68亿张。信

用卡需要健全坚实的社会信用体系支撑,而在信用体系尚不完善的时候就大量发放信用卡,其风险不言而喻。于是信用卡泛滥的背后,很多问题也随之凸现,透支不还就是其中之一。而出现赖账不还时,银行便将催款业务外包给讨债公司,这事实上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

从“霸王收费”到“霸王条款”,银行的霸道这些年一直受到诟病,而现在的“霸王讨债”,再一次让人们领教了银行的霸道,也更感到了惶恐和无奈。在强大无比的银行面前,我们大家都犹如一棵草。银行滥用其强势地位,已经习惯了自然,一事当先,为所欲为已达成共识,脑子里甚至根本没有是否合理合法的概念。今天银行都说要“做大”、“做强”,然而在制定规定和流程时,只规避自身风险,对客户不公,甚至知法违法的银行,事实上更是自己丢弃了进步的动力,能走多远已是问题,遑论“做大”、“做强”?

奚旭初

焦虑的母亲告诉女儿要多加相亲活动,在一个她还“值钱”的年龄。

30余年来,市场经济重塑了本土的婚恋面貌,而相亲这种古老的传统也拥有了某种商品的的味道。就像要在股市中选择一只绩优股一样,人们热切地期望能够在市场中找到最好的那个人。(10月31日《中国青年报》)

物质年代的相亲 异化成交易

“在中国,浪漫往往输给现实;相亲很大一部分已经变成商业交易。”大洋彼岸的《纽约时报》这样评价本土式的相亲热潮。这里的“现实”是什么?很难说,因为其中有太多的确定与不确定因素。从表象到本质,可以概而言之,就是很多传统的婚姻要素已经不存在了,只留下“两性”的存在,只留下交易的存在。

婚恋关系既是简单的,又是复杂的,这要看一个人怎么理解。婚恋的实质就是嫁与娶之事,就是对男和女结合在一起共同生活的一种社会现象的表述,就是“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的日常。它还是两个人的共同幸福并因此而感受到的成就感。

婚恋关系可以如萝卜白菜那样,各有其爱,但又不可以像萝卜白菜一样,买来卖去。相亲,无非就是对配偶所做的选择。而物质年代的相亲买卖,左挑右选,则形同一个人去市场买件物品。那些卖女儿的首先考虑的不是她与相亲对象的关系基础,不是她的未来生活,而是要在现场卖个好价钱。

在现代社会里,只有那些能够自主的人,才会执著于个人权利和自由,才更愿意在个人努力的基础上选择自己的婚恋对象。根据美国社会学家富特的观点,相互支持和相同的社会背景是持久的婚姻关系的要素。他把婚姻表述为“一个人和另一个人之间最有利于双方充分发展的关系”。而在社会学家波普诺看来,双方在感情上得到满足,就必须承认对方的要求和愿望,还必须把对方看作独立的个人。这样的关系“既和双方的个人成熟有关,也和他们之间共同的、至少应是一致的基本价值和信仰有关”。

价值观决定人们的婚恋想法,决定一个人对婚姻关系的要求。在消费时代,与爱不爱相比,能不能通过两个家庭的生活达到某种理想的生活水平似乎才更加重要。也可以说,由于过于注重外部条件,婚姻在本质上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积累资源的方式。在这样的意愿框架里,爱算什么?又能值几个钱?货不是要比两家,而是要比多家,这还不是传统的门当户对,而是要像植物一样攀缘住这个物质年代。

物质年代的相亲买卖,说到底,就是一方向婚姻对象索要一张饭票,买一个安全感。嫁汉嫁汉,穿衣吃饭。从这个意义上说,相亲买卖又像是完成一项向祖宗传统、旧时代文化意识的穿越。世界在进步着,现实的婚姻关系却在混乱着,物化着,退步着,与独立、自主、自由的支配权、成熟的个性等疏离着。需要责难这种和实用主义哲学纠缠在一起的相亲买卖吗?似无必要,似不应该。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他们只是在找他们的道理,那应是一种自由权利。再说了,做个道德家,站在某个道德制高点上对此责难,又有什么用处?

今语

32岁的苏丹,39岁的田新丙,这对相伴10年的夫妻今年6月离婚。但两个月后,田新丙查出肝硬化中晚期,并伴有新生小肝癌。为了挽救前夫的生命,苏丹花了两个月的时间说服田新丙复婚、捐肝。

“复婚为夫捐肝”的故事 温润心田

日前,他们刚做完了捐肝手术。苏丹说:“我要不去做,心里会不踏实的。”

于茫茫人海中,找到爱心人士肝源不容易,而前妻坚持复婚为前夫捐肝,恐怕更为罕见。虽然他们当初的离婚多少有些冲动的成分,但现实中不乏夫妻大难临头各自飞的案例,在离婚状态下,丈夫遭逢重病,无疑会让本已破裂的感情更为飘摇。但苏丹还是用行动告诉世人,在病魔面前,人性的抉择会焕发怎样动人的色彩。苏丹如果不选择挺身而出,从情理上也能理解。捐肝并非没有风险,他们就曾亲眼目睹,身边一个大哥因同样的手术而出现感染离世。但内心深受震撼的同时,苏丹没有退缩,背着前夫自己去体检,发现符合捐肝条件力主复婚,面临伦理审查时痛哭请求……还有什么能比这不掺杂质的爱和付出更感人肺腑呢?

抛开所有的世俗利益考量,面对一个濒危的生命,本能的选择自然是伸出援手。但置身家庭和社会之中,人们的太多抉择都会不可避免地染上尘埃。就在前两天,媒体报道了一对夫妻因为感情纠葛,而没有为患白血病的儿子捐骨髓,最终孩子带着遗憾离开人世。孩子死后,这对夫妻仍然在网上相互攻讦,令人非常心寒。显然,因利益、胆怯等各种因素羁绊,很多人会在需要挺身而出时选择退缩。退缩当然值得批判,但是,挺身而出,仍会遭到动机的审查。以至于医院伦理委员会的专家们看着苏丹夫妻的资料都会琢磨,是大家有钱,背后存在金钱交易,还是别的原因,让这个离婚了的女人坚持复婚捐肝?

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才更能体味出一个女人,做出如此选择的动人之处。顺本性而为,更弥足珍贵。这个打动人心的故事,主人公所为,说穿了可能只是淡淡的一句:“我要不去做,心里会不踏实的。”但在这份忧国忧民,有多少人会在面对各种选择的时候,能够忠于自己的内心,让善念成为指引自己的明灯呢?

让我们祝福这对勇敢而幸福的夫妻要破镜重圆、健康安乐。他们的恩爱携手,战胜的不仅是病魔,还有这时代人性所陷入的冷漠和彷徨。也希望,这个大时代小人物的感人故事,温润我们的心田。

完荣